

高管背景特征与上市公司 财务重述类型的关系

许宏 黄辉

(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 重庆 400067)

【摘要】 财务重述可以进行多角度分类,不同类型的财务重述有着不同的高管背景特征。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2003~2010年的财务重述公司为样本,采用配对分析、逻辑回归等方法研究高管背景特征与不同财务重述类型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团队规模越大,非欺诈性财务重述越容易发生,且非核心财务重述也越容易发生;高管团队中男性越多,非核心财务重述越容易发生;高管团队学历、高管团队年龄对财务重述类型没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 高管背景特征 财务重述 财务重述类型

一、引言

财务重述就是上市公司对前期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存在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的一种会计行为。财务重述通常被认为是上市公司高管选择的一种激进的会计政策。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财务重述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往往表现为负面影响。比如引发了负面的市场反应(Palmrose, 2004; Frieder, 2008)、增加了融资成本(Hribar and Jenkins, 2004; Graham, 2008)、降低了企业价值(Karpoff, 2010)、引起了股东集体诉讼(Palmrose and Scholz, 2004)等等。

虽然对财务重述负面影响的研究很多,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财务重述的原因和动机,但较少有从高管背景角度研究财务重述的文献,更是缺乏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类型关系的研究。

笔者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发现上市公司高管影响财务重述的实证结论并不一致(Ahmed, 2007)。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考虑管理层背景,也即把管理层全部视为同质的而忽略了管理层的异质性。管理层的背景包括年龄、职能、教育等很多方面,财务重述也有欺诈性与非欺诈性、核心与非核心财务重述之分。

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是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的高层团队理论(TMT),通过配对分析、逻辑回归等方法研究了高管背景特征与不同财务重述类型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规模越大,非欺诈性财务重述和非核心财务重述越容易发生;高管团队性别中男性比重越大,非核心财务重述越容易发生;高管团队学历、高管团队年龄对财务重述类型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非常稳健,可能的学术贡献在于从财务重述类型角度来研究高管背景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我国现有的财务重述研究,也为政府等监管部门

进行信息披露管理提供了依据。

二、文献回顾

1. 高管背景的文献回顾。从Amason(1997)、Knight(1999)、Carpenter(2001)、张平(2005)和谢凤华(2008)等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对高管团体异质性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大多都从高管职能、任期、教育、年龄这四个方面的异质性来界定高层团队理论(TMT)的异质性。因此,本文也延续选用其中的后三个变量作为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的衡量指标。

(1)任期异质性。Finkelstein和Hambrick(1990)曾专门研究了高层团队理论(TMT)任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高层任期越长,其越会规避风险。Staw(1980)和Schmidt(1983)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高管任期异质性会影响企业管理者对企业文化的认同。Lawrence(1989)等人的研究表明,任期异质性与企业的凝聚力显著负相关。谢凤华(2008)通过对民营企业的调查取样,用实证的方法证明任期异质性与生产过程绩效显著正相关。

(2)教育异质性。Wiersema(1992)等人的研究表明,企业高管教育异质性会对企业战略改变产生显著的影响。Simons(1999)等人的研究认为教育水平差异较大的高管团队得到的信息更广泛,决策方案也越多。Knight(1999)认为高管团队教育异质性越大,就越容易引起冲突。Tihanyi(2000)细分了高管团队的教育专业,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所受教育异质性越大,其所在的企业越容易生存下来。Carpenter(2002)研究也表明,企业高管教育异质性越大,其所在的企业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更容易生存下来。

(3)年龄异质性。Moreland(1985)和Triandis(1993)等人的研究表明,年龄异质性的会引起团队冲突,甚至会造成团队的分裂。Zenger(1989)和Jehn(1997)等实证检验了年龄异质性会对

组织的绩效、合作产生负面影响。Amason (1996) 和Pelled (1997)等提出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企业绩效是二次曲线的关系, Richard和Shelor(2002)也有同样的发现。但张平(2005)研究却表明企业高管教育年龄异质性的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

2. 财务重述类型文献综述。

(1)财务重述类型。美国审计总署于2008年曾对财务重述类型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在其研究报告中将财务重述划分为九种类型。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在2002年以前,因为收入确认而发生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最多,占重述总数的39%;在2002年以后,因为成本费用而发生财务重述的比例逐渐增大。

(2)涉嫌欺诈性财务重述的市场反应。已有大量国内外文献研究了市场对财务重述不同类型的反应。据Carpenter(2002)统计发现,市场反应最敏感的是因为企业违反相关规定的财务重述。Palmrose(2003)等人的研究表明,涉嫌非欺诈和欺诈的财务重述公司在发生财务重述的当日其平均累计超常收益依次为6%和-20%。Hirschey(2005)的研究也表明,涉嫌欺诈和非欺诈的财务重述公司在重述公告前后三天的累计超常收益依次为-21.8%和-7.73%。Owers(2006)实证检验了不同的财务重述类型会导致不同的市场反应,因会计原因而导致的财务重述的市场效应最强烈,且市场反应一般为负面效应。

(3)涉及核心财务重述的市场反应。市场反应会因财务重述的内容不同而有所差异,市场反应最敏感的是财务重述的内容涉及会计核心科目(例如:收入、费用、利润等会计科目)。Anderson(2001)的研究表明,当财务重述涉及收入这个会计科目时,其市场反应最为明显。Collins(2002)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市场反应最为糟糕的是因收入确认问题导致的财务重述。Palmrose(2004)则研究了财务重述与股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务重述和降低盈利的重述市场分布导致股价下降9%和13%。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自从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高层团队理论(TMT)以来,公司高层管理团队就一直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热点之一。将高层管理团队特征分成两类:一类是高层管理团队心理特征(价值观、管理者认知、思维逻辑),另一类是高层管理团队客观特征(年龄、团队规模、职能、社会背景、教育)。其中,高层管理团队的客观特征是大量学者所关注的重点,一个可能的原因便是该类指标易于观察与测量。高层管理团队的客观特征通常包括任期、管理者的年龄、教育背景、职能类型、经济基础、社会关系等。

高层管理团队(TMT)被看成是解决管理者在动态复杂环境中能力不足的有效方案,因为其合作效用巨大。研究高管团队的异质性能够深化和延伸高层管理团队理论。大量的国内外文献选用高管团队规模、高管团队性别、高管团队学历、高管团队任期、种族、文化等指标来衡量高管异质性。

1. 高管团队规模。公司高管团队规模越大,其内部冲突发生的频率越高,它将会影响公司高管团队决策的正确性(Palmrose和Owers,2002)。财务重述是公司高管团队一项重要的会计政策选择,是较大规模管理团队非正确的决策结果。高管团队规模越大,高管团队形成的利益中心的个数便越多。财务重述正是为了使企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达到相对平衡的一种迫不得已的决策。同时,高管团队规模的每个利益中心为了各自的利益,其共同的目标很可能就不是企业价值最大化,财务重述正是在这种纷争中孕育而生。

高管团队规模越小,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成本会越小。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就是高管团队的异质性(年龄、教育背景、职业背景等)造成的,不同的高管因为不同的阅历、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处理方式对待同样的问题会有不同的意见,甚至会有利益冲突。据此分析,协调沟通成本也随之增加(Anderson和Yohn,2005),这将可能使其做出非理性决策结果,导致财务重述的发生。

财务重述是一项激进的会计政策选择,高管团队规模越大,高管团队的归属感会下降,他们可能更容易选择财务重述,因为他们对其经济后果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Allen(1969)、Staw(1980)和Schmidt(1983)研究发现,高管团队规模会影响企业管理者对企业文化的认同。Lawrence(1976)、O'Reilly(1989)和Hambrick(1989)研究发现,高管团队规模越小,其凝聚力就越大,凝聚力会因团队规模的增大而相对变小。高管团队规模与高管团队之间的沟通的质量和数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Lawrence,1993),那么缺少这种深层次的交流通常会致团队缺乏凝聚力及归属感,因而导致财务重述发生。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H1:上市公司高管团队规模越大,非欺诈性财务重述越容易发生。

H2:上市公司高管团队规模越大,非核心业务财务重述越容易发生。

2. 高管团队性别。大量的国内外管理学文献和心理学文献研究表明,不同性别的高层管理者,其行为方式也不一样。相比于男性企业家,女性企业家所经营的企业相对更容易在行业中生存下去(Boden和Nucci,2000)。相对于男性管理者,女性管理者表现得更沉稳,而男性管理者则更多表现出自信,从而更容易做出非理性的决策(Peng和Wei,2007)。财务重述通常被认为是上市公司选择激进会计政策的结果,同时大量的研究也发现,发生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男性比例往往较高。其他研究也发现,公司治理机制相对完善、公司产权相对清晰的上市公司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性别比例比较分散(Adams和Ferreira,2009)。财务重述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公司缺乏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公司的产权结构不清晰。因此,上市公司男性的比重与财务重述呈正相关关系。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下面两个假设。

H3: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男性比例越大,非欺诈性财务重

述越容易发生。

H4: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男性比例越大,非核心财务重述越容易发生。

四、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1)样本选择。本文结合相关国内外研究,并参考证监会和企业会计准则中的相关规定,将财务重述定义为:财务重述就是上市公司对前期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存在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的一种行为。

本文依据各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高管信息,认为上市公司高管层包括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董事)、监事会(监事会秘书、监事会主席、监事)、其他高级经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财务副总监)等。

本文的研究样本是2003~2010年沪深两市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按照于鹏(2007)所说的手工检查上市公司年报的方法来获得初始样本,剔除已经退市、金融保险行业和数据不全的公司(主要是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指标缺失的公司)。我们同样采用Agrawal(2005)的标准和方法来选择配对公司:①年度、上市地区、行业以及总资产规模这四项标准是最接近的;②在2003~2010年期间没有发生财务重述;③如果上市公司在研究期间多次发生财务重述,选择的配对样本应该相同;④解释变量指标和控制变量指标便于获得。

通过上述两种方法,我们收集到的财务重述样本为1 516家公司和相应的1 516家配对公司,其中2003~2010年的样本公司数量分别为394家、328家、336家、248家、240家、252家、261家和230家。

(2)数据来源。结合大量文献,本文把企业违规并受到证监会处罚界定为“欺诈”。按照财务重述是否涉嫌欺诈,财务重述可以简单分为欺诈性财务重述和非欺诈性财务重述;把涉及收入、费用、成本的科目界定为核心会计科目,按照财务重述是否涉及核心会计科目,财务重述又可以分为核心财务重述和非核心业务财务重述(Collins, 2006; Desai, 2008; Ferreira, 2009)。

本文的初始财务欺诈样本是依据国泰安(CSMAR)中2003~2010年处理违规数据库中因违规而受到处罚的上市公司,欺诈性财务重述公司样本即为既发生财务欺诈性行为又有财务重述的样本。核心财务重述与非核心财务重述的数据同样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其区分是手工逐一查找其年报来认定的。通过对财务重述两种类型的界定,其中按是否发生欺诈性的财务重述,我们收集到有178家上市公司发生欺诈性财务重述,有1 338家上市公司发生非欺诈性财务重述;按是否涉及核心会计科目,我们收集到有718家上市公司涉及核心财务重述,有798家上市公司为非核心财务重述。

2. 变量解释。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财务重述(res),当上市公

司发生财务重述时,res取值为1,否则为0。

(2)解释变量。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通过参考Moreland和Stephan(1985)、Prendergast和Stole(1996)、Fraser和Greene(2009)、于鹏(2007)、姜付秀(2009)、王霞(2010)等人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包括高管团队规模(mscale)、性别(mgend)等作为衡量高管背景特征的指标。

(3)控制变量。为增加实证结果的可信赖程度,本文借鉴已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参考Jensen和Meckling(1976)、Romamus等(1990)、DeFond和Jambalvo(1991)、Beasley(1996)、Burns等(2006)、于鹏(2007)、Ahmed等(2007)、杨清香等(2009)、Kravet(2010)等人的研究成果,引入了以下几个控制变量: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A)、公司规模(lna)、董事会结构(ind)、是否有国有控股(ss)、行业变量(indu)、年度变量(y)。

本文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代码	经济含义	定义及赋值方法
被解释变量	res	财务重述	发生财务重述为1,否则为0
	mscale	高管规模	年报中披露的所有高管人员个数
	mgend	高管性别	所有高管性别的平均数。其中,男性高管取值为1,女性高管取值为0
	mage	高管年龄	所有高管平均年龄
	mdegr	高管学历	高中或中专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依次赋值为1、2、3、4、5
	mtime	高管任职时间	所有高管担任限职的平均任职时间
解释变量	large	股权集中度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ind	董事会结构	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
	lev	资产负债率	公司年末债务账面总价值/资产账面总价值
	lna	公司规模	公司年末总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
	roa	盈利能力	上市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
	ss	控制人性性质	是否为国有控股,取值为1,否则为0
	indu	行业	采用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将所有上市公司分为21个行业(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除制造业按亚类进行分类外,其他行业都为大类。共设立20个虚拟变量
	y	年度	以2003年为基准,设立8个虚拟变量

3. 回归模型选择。对于财务重述类型的选择,使用如下的检验模型:

$$\text{Logistic} \left(\frac{\text{res}_i}{1-\text{res}_i} \right) = \beta_0 + \beta_1 \text{mscale} + \beta_2 \text{mgend} + \beta_3 \text{mage} + \beta_4 \text{mdegr} + \beta_5 \text{mtime} + \beta_6 \text{large} + \beta_7 \text{ind} + \beta_8 \text{lna} + \beta_9 \text{roa} + \beta_{10} \text{ss} + \alpha_1 \sum_{i=1}^{20} \text{indu}_i + \gamma_j \sum_{j=1}^8 y_j + \varepsilon$$

式中:res_i为哑变量,res₁=0表示其发生的是欺诈性财务重述,否则res₁=1;res₂=0表示其发生的是核心财务重述,否则res₂=1。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1. 描述性统计。表2和表3分别是发生欺诈性与非欺诈性以及核心与非核心财务重述公司的高管背景特征的描述性统计。由表2可知：①欺诈性的财务重述高管团队规模(16.87)小于非欺诈性财务重述(18.8),但差异不显著；②欺诈性财务重述中公司高管性别(0.874)大于非欺诈性财务重述(0.866),差异同样不显著；③欺诈性财务重述公司的高管年龄小于非欺诈性财务重述,并在10%的水平上非常显著；④欺诈性财务重述公司的高管学历(3.097)小于非欺诈性财务重述(3.115),差异也不显著；⑤欺诈性财务重述公司高管任职时间(1.981)大于非欺诈性财务重述(1.945),同样不显著。

由表3可知：①核心重述公司团队规模(17.43)小于非核心财务重述(18.38),其在5%的水平上显著有效；②核心重述公司高管团队性别(0.861)小于非核心财务重述(0.871),虽然有一定差异,但不显著；③核心财务重述公司高管年龄小于非核心财务重述；④核心财务重述公司高管学历(3.123)大于非核心财务重述(3.109),在1%的水平上显著有效；⑤核心财务公司高管团队任期时间(1.941)小于非核心财务重述(1.952),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不显著。

表2 欺诈性和非欺诈性财务重述公司高层背景特征描述性统计

变量	欺诈性财务重述公司		非欺诈性财务重述公司		T检验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mscale	16.87	4.006	18.08	4.006	1.363
mgend	0.874	0.095	0.866	0.095	0.111
mage	4.482	3.087	4.614	3.087	6.657***
mdegr	3.097	3.440	3.115	3.440	0.026
mtime	1.981	8.175	1.945	8.175	1.737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有效(下同)。

表3 核心和非核心财务重述公司高管背景特征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核心重述公司		非核心重述公司		T检验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mscale	17.43	3.749	18.38	4.095	4.636**
mgend	0.861	0.096	0.871	0.092	0.795
mage	4.592	2.936	4.612	2.936	2.646
mdegr	3.123	3.498	3.109	3.498	2.876*
mtime	1.941	8.356	1.952	8.356	0.151

通过表2和表3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我们认为高管背景特征与不同类型的财务重述存在相关性,初步验证了本文假设。

2. Logit回归结果分析。对于高管背景特征与不同类型的财务重述的相关性,我们的分析方法如下：①先把5个解释变量分别代入检验模型中；②将全部变量同时代入检验模型中。依据上述方法,我们可以得到表4和表5的回归结果。

表4 高管背景特征与非欺诈性财务重述的实证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constant	3.027*	3.021*	0.126**	2.441*	2.718*	1.215*
large	2.423*	2.285*	2.284*	2.322*	2.326*	2.362*
ind	4.595	3.113	3.397	3.243	3.087	4.097
lev	0.197	0.198	0.194	0.196	0.194	0.202
ina	-0.216	-0.084	-0.163	-0.088	-0.091	-0.296
roa	5.018***	5.064***	4.917***	4.996***	4.993***	5.098***
ss	0.134	0.178	0.052	0.174	0.186	0.012
mscale	0.099**					0.096*
mgend		-0.756				-1.121
mage			0.088			0.105
mdegr				0.019		0.227
mtime					-0.096	-0.176
indu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51 6	151 6	151 6	151 6	151 6	151 6
-2log likelihood	142.535	144.547	143.533	144.617	144.496	141.051
pseudo-r ²	0.205	0.194	0.197	0.193	0.192	0.211

(1)依据表4的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上市公司高管团队规模的回归系数为0.099,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其表示的含义是上市公司高管团队规模越大,非欺诈性财务重述越容易发生。

高管团队性别、年龄、学历、任职时间与非欺诈性财务重述的回归结果分别为-0.756、0.088、0.019、-0.096,表明高管团队性别和任职时间分别与非欺诈性财务重述负相关,高管团队年龄与学历分别于非欺诈性财务重述正相关,虽然都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但都不显著。

以上分析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公司高管团队规模增大了,来自不同背景的管理者也在增加,不同的观点也随之增加,这就导致他们所在的公司会选择财务重述这种激进的会计政策。然而欺诈性财务重述会产生很严重的经济后果,正是基于此他们就很有可能选择非欺诈性财务重述。

(2)依据表5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上市公司高管团队规模与非核心财务重述的回归结果为0.053,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②上市公司高管性别与非核心财务重述的回归结果为1.149,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③上市公司高管年龄、学历、任职时间与非核心财务重述的回归结果分别为-0.022、-0.232和0.036,上市公司高管年龄、学历与非核心财务重述负相关,上市公司任职时间与非核心财务重述正相关,虽然都有一定的相关性,但都不显著。

从而假设3没有得到证明,假设4得到证明。我们分析其原因是核心财务重述有很严重的经济后果,基于以上考虑,高管可能会规避核心财务重述,但会选择非核心财务重述。

表5 高管背景特征与非核心财务重述的实证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constant	-4.561 **	-5.928 ***	-4.294 **	-4.525 **	-4.965 ***	-4.312 *
large	0.386	0.295	0.314	0.265	0.296	0.398
ind	2.091	1.636	1.451	1.628	1.528	2.476
lev	0.167 **	0.165 **	0.172 **	0.175 **	0.167 **	0.175 **
ina	0.122	0.175 *	0.205 **	0.203 **	0.191 **	0.150
roa	3.227 ***	3.153 ***	3.298 ***	3.242 ***	3.265 ***	3.110 ***
ss	0.238	0.286	0.317	0.300	0.291	0.299
mscale	0.053 **					0.055 **
mgend		1.491 *				1.699 *
mage			-0.022			-0.041
mdegr				-0.232		-0.296
mtime					0.036	0.063
indu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 516	1 516	1 516	1 516	1 516	1 516
-2log likelihood	488.575	489.818	490.908	490.746	491.128	485.659
pseudo-r ²	0.068	0.064	0.063	0.062	0.061	0.072

总之,高管背景特征与不同的财务重述类型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显著性有弱有强。公司高管通常会选择非欺诈性财务重述和非核心财务重述,因为这两类财务重述的经济后果相对于欺诈性财务重述和核心财务重述要小很多。公司高管可能会通过选择财务重述这种激进的会计政策来操控企业会计信息。

3. 稳健性测试。为了使上述结果更加可靠,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测试:①本文剔除了2010年的样本值,按文中表4和表5重新回归,得出的结论与文中的结论一致。②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用净资产报酬率(roe)替代资产报酬率(roa),得出的结论与文中的结论一致。③因为非欺诈性财务重述公司的数量(1 318家)远远大于欺诈性财务重述公司的数量(178家),我们将解释变量设定为欺诈性财务重述(res₁),使哑变量的取值相反,res₁=1表示其发生的是欺诈性财务重述,否则res₁=0。

按表4重新回归,在5%水平下mscale的系数显著为-0.0997,得出的结论与文中的结论一致。

六、结语

本文选取我国沪深两市2003~2010年间A股上市公司中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为样本,区分其财务重述的类型,统计分析高管规模和性别等背景特征,并实证检验了高管背景特征对不同财务重述类型的影响。

本文的实证结论表明:高管团队规模越大,非欺诈性财务重述越容易发生;高管团队规模越大,非核心财务重述越容易发生;高管团队年龄越大,非核心财务重述越容易发生。由于财务重述具有经济后果、法律后果等,本文从高管背景特征角

度来研究不同类型的财务重述。研究表明,企业高层管理者会用财务重述这种激进的会计方式来操控企业的会计信息。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高层梯队管理理论,对我国明晰产权关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不同高管背景特征选择何种类型的财务重述的机制,并为完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相应的思路。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的财务重述还缺乏统一格式,本文在对财务重述性质的分类以及滞后期的整理中,尽管严格采取了于鹏(2007)对财务重述初始样本的获取方法,但难免也融入笔者的主观判断。未来的研究,不仅要保证更多和更准确的样本及其配对样本,还应考虑到我国特殊的国情,如行业特征、制度变迁、地域限制、宏观经济等因素,从多个角度来研究财务重述行为。

【注】本文系重庆市教委科技项目“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国企高管薪酬激励研究”(项目编号:KJ110718)的阶段研究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

1. 何威风. 财务重述: 国外研究述评与展望. 审计研究, 2010; 2
2. 姜付秀, 尹志宏等. 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管理世界, 2009; 1
3. 姜国华. 基于会计信息的证券投资策略研究: 分析及展望. 会计研究, 2005; 11
4. 孙海法, 姚振华, 严茂胜. 高管团体人口统计特征对纺织和信息技术公司业绩的影响. 南开管理评论, 2006; 9
5. 王霞, 薛爽. 财务重述、盈余质量与市场认知的系统性偏差. 中国会计评论, 2010; 4
6. 王毅辉, 魏志华. 财务重述研究述评. 证券市场导报, 2008; 3
7. 魏立群, 王智慧.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 2002; 4
8. 魏志华, 李常青, 王毅辉. 中国上市公司年报重述公告效应研究. 会计研究, 2009; 8
9. 魏志华, 王毅辉.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财务重述研究述评.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7; 11
10. 于鹏. 股权结构与财务重述: 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经济研究, 2007; 9
11. 张龙, 刘洪. 高管团队中垂直对人口特征差异对高管离职的影响. 管理世界, 2009; 3
12. 张为国, 王霞. 中国上市公司会计差错的动因分析. 会计研究, 2004; 4
13. 周晓苏, 周琦. 国外财务重述研究述评及启示.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1; 9
14. Adams, R.B., Ferreira D.. Women in the Boardroom and Their Impact on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9; 9